

共和国

文学

文学

文学

文学

伍仁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第

2

卷

# 共和国 重大事件 纪实

第2卷

(修订版)

伍仁 编

I25  
1314  
.2 I25  
1314  
.2

西北大学出版社

ISBN 7-5601-1132-1

SBUB4/8

2%

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第2卷)

(修订版)

伍仁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长安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3.75印张 340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

ISBN 7-5604-1155-X/I·159

定价:17.80元

# 目 录

---

## 一代精英

- 上海知青支边 25 年追记 ..... 言 鸣(1)

## 历史沉思录

- 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 20 周年祭.....  
..... 胡 平 张胜友(22)

- “九一三”事件始末记 ..... 大 鹰(99)

- 命运:天安门事件始末 ..... 杨匡满 郭宝臣(158)

## 唐山大地震

- “7·28”劫难十周年祭 ..... 钱 钢(239)

# 一代精英——上海知青支边 25 年追记

---

## 言 鸣

在中国当代青年运动史上，这是难以磨灭的壮丽的一页。近十万城市知识青年，高唱青春之歌，踏着时代鼓点，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祖国极西部的荒原上，来到世界第二大沙漠——被人称为“进去出不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在这块旷远、蛮荒的土地上，用古老的手工工具、原始的生产方式，拓荒种田，创业安家，演出了一幕幕悲壮感人的活剧！

那是 1963 年夏秋，至今已有 25 个年头了！那是当代中国一场人口大迁移，一场文明大转移，使东部的聪慧灵巧和西部的粗犷奔放得到了某种交融；这是一场中国当代开发西部边疆的壮举，这个壮举将随着历史年代的推移而显得越来越令人难忘。1983 年，担任总理的赵紫阳同志看望那里的上海支边青年时说：“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哦，上海支边青年！

60 年代的一代精英！

## 茫茫天涯路

从上海到新疆乌鲁木齐，铁路线总长 3900 余公里。

从乌鲁木齐到塔里木盆地，公路线总长 1030 公里。两项相加，  
可谓是万里迢迢。

可是，他们是唱着歌来的。

当时的歌真好听：

“打起背包走天下，我们都听党的话……”

“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一人领唱，众声应和，这些歌声点燃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

有一位 14 岁的小姑娘，就是被这歌声召唤到新疆来的。她叫小密，是国民党爱国将领程潜老先生的孙女。当时，小密的爸爸在上海警备区任职。按理，像这样的家庭，小密会有一条人生的坦途，她完全可以在别墅里操琴练声，完全可以在花圃中吟诗作文，可是，这一阵阵激情的歌声把她的芳心打动了。

那时，小密在上海淮海路一个街道活动室中玩。她第一次认识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真高兴呐，唱着歌，讨论着未来。

“我也能和你们一起去新疆吗？”小密扭着头问。

“行呀，不，你还太小，14 岁，才读初二。”

“那还要等几年？”

起码两年！”

啊，两年，时间太长了！小密到底是将门之后，干起事来干脆利落，她偷出了家中的户口本，裤袋中放着两个铁陀，去报名了。她战战兢兢地上了体重秤——92 斤。通过了，她可高兴了！谁知道她里边西装裤里放的铁陀足有八斤！

小密要走了，妈妈连为她打点行装也来不及，到北站送行那天，哭得像泪人似的。可小密却满不在乎：“妈，我去新疆锻炼锻炼，这是好事嘛，你哭什么呀！”妈说，“小密，你才14岁……”小密说：“刘胡兰牺牲时才15岁呢！”说着，自己也不禁掉了泪。她妈妈赶紧给她一方手帕，那是妈妈洒了香水的绣花绸手帕，可小密擦了擦泪水，从车厢上把手帕甩给了妈妈：“让泪水见鬼去吧，我才不哭呢！”列车就这样开走了。

啊，这就是我们60年代的青年！当时的祖国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低谷中爬出来，人们对吃豆渣、吃老莱菜的经历还记忆犹新。可是为了分担祖国的困难，他们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茫茫天涯路，踏上了西行的征途。

## 梦的幻灭

十七八岁，正是充满着梦幻的年月。

十万上海支边青年用自己美好的青春和对理想的渴求在编织一个浪漫之梦。

从上海来时，这些未谙世事的“阿拉”们对遥远的新疆只有一种朦胧的感知。大沙漠……绿洲……牛奶多得用来洗脸……花一角钱可以到果园吃个饱……梳着几十条发辫的维吾尔小姑娘……骑马、骑骆驼、骑毛驴……还有神秘的令人捧腹的纳斯尔西·阿凡提……

可是，迎接他们的却是远离社会文明的清苦的大漠生活。

当他们张开眯蒙的眼睛，面对着长满芨芨草的戈壁的时候，当他们不得不低着头进出于原始洞穴般的地窝子的时候，当他们吞食着粗硬的玉米饼子和高粱馍馍的时候，当他们望着绿色菜汤上仅有几片油花而发呆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选择的是一

条艰苦的生活道路：这里没有奶油蛋糕话梅糖，没有烤扁橄榄酱芒果，没有小笼馒头炸春卷，没有大光明大世界，到这里来，有的只是两个字——吃苦。

那时的日子也真够苦的。

有这样一个青年，他进疆时已经24岁，身高六尺，体态魁伟，是江南子弟中难得的大汉。他干起活来，真是一员虎将，百十斤的担子，两只手提起来飞跑。可他有难言的苦衷：整天处于一种饥饿状态之中。一天三个馒头，还没有品个味就全没了。一个月三元津贴，全部用来买馍馍，以致于连八分一张的邮票也买不起。傍晚，他孤独地在连队四周转悠，肌肠辘辘，两眼冒火，总想找点东西来塞肚子。终于，他发现在连队猪圈的锅里，有不少煮熟的玉米粒。于是，在夜晚他就偷偷地溜到猪圈，把煮熟的玉米粒从猪食中拣出来，用清水一漂，放上几粒糖精，煮了一茶缸，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他是个高中毕业生，写得一手好字，他写的柳体字在区一级的书法比赛中获过奖。然而，他怎么也克制不了自己，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干起了这种有辱斯文的事。一天，他被喂猪的老头逮住了。那老头要送他去见指导员，他苦苦哀求：“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呀！我妈生了我这么大个子，我没有办法……”

听着他带有抽泣之音的话语，令人心酸。

物质上的饥饿仅仅是一方面，精神上的饥渴更甚于此！

一天十小时的劳动，十天有一天休息。没有马路，没有花园，没有剧院，没有图书馆，连仅有的几份报纸都是给干部们垄断了的。每天，当青年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地窝子时，等待他们是一顿食之无味、弃之不忍的夜餐。夜餐后，在空旷的连队上空，用一块破犁铧做成的犁板钟敲响了，常常伴随着一个单调的毫无感情的声音：“各班排学习啰！”“开大会啰！”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当然，也有开心惬意的时候。星期天，姑娘和小伙子们可以脱掉黄军装，穿上了上海式样的茄克衫、西装裤，裤腿窄窄的，显得那么洒脱。花上八角钱到场部去照上一张像，花上一元钱吃上



一碗蛋炒饭，或买上一些自己的日用品。精打细算地计划着属于自己的每个月的三元津贴。

有时，连队也组织一些晚会。青年们用家乡的歌声来抒发自己的心绪，有时是为了排遣自己的愁闷，可往往带来了更多的忧伤。

有这样一个令人伤感的晚会。

在塔里木河畔的一个连队里，正在举行一个营火晚会。火，哔哔剥剥地烧着。不远处，塔里木河夜浪澎湃，哗哗的水涛声和跳跃的红火苗，给这个晚会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诗意。

“下面请连队的沪剧大王王巧云表演——”连队晚会的主持人高兴地宣布。

啊，王巧云，一个灵秀的姑娘，两只传神的眼睛顾盼间顿生妩媚，一副清亮的嗓子在啼笑中更传深情。她在上海是学沪剧的，只因家庭出身不好，便被动员来了新疆。

“来一段《星星之火》！”观众们兴奋地叫着。

《星星之火》是以包身工的身世为背景的，60年代初曾风靡上海，其中“母女相会”一折是沪剧中的保留节目。一提到这，几乎每个上海人都会哼几句：

盼星星，盼月亮，千盼万盼盼亲娘，  
到如今，盼到你妈妈到上海，  
妈妈啊，何时领我回家乡……

词意缠绵，曲调凄切，催人泪下。

歌声一起，竟想不到众声齐和，先是唱，后是啼，继而全体上海知青竟失声痛哭。王巧云边唱边演，此情此景，使她完全进入了角色，最后竟昏倒在黄土铺成的舞台上。

啊！妈妈，世上最崇高的称谓，一声呼唤，勾起了多少人的亲情！在边疆清苦的生活中，妈妈是希望的明天，妈妈是灿烂的

太阳！人同此心，孰能例外？

然而，这可招来了麻烦。

连队指导员找到了王巧云，狠狠一顿批评，要她交代用心，要她挖掘阶级根源，要她在大会上作检查。屈辱，郁闷，使这位富有艺术素养的姑娘顷刻间泪如泉涌。她哭着、笑着，神经错乱了。

如果说这些上海支边青年是苦难的时代的牺牲品，那是一点不为过的。那个年代里，有些豆蔻年华的青年，除了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外，竟没有必要的营养，没有青春的欢悦，没有成才的阶梯，没有人的个性，他们仿佛只是一群穿着黄军装的麻木了的灵魂。然而，就是他们，正是他们，用自己热血和汗水在塔里木耕耘，用清教徒式的苦涩的人生岁月谱写了中国西部开发史上辉煌的一页。

## 魂归大戈壁

今天我们追忆上海支边青年进疆 25 年的风风雨雨的时候，我们不能忘却那些为建设塔里木过早地献出自己生命的朋友。

日本电影《望乡》中有一组扣人心弦的镜头：夕阳西下，在南洋的墓地上，“阿崎婆”们的墓碑高高竖立，遥遥地望着北方的故乡。而今，当我们在塔里木河畔漫步时，也常常可以遇到类似的情景。我们可以在一个个耸立的墓碑上，看到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他们生在黄浦江畔，却在塔里木河边献出了自己壮实的生命。

于是，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他已长眠在塔里木河和阿克苏河的交会处，长眠在长达 243 米的拦河大坝的身旁。

他叫戴根发，是 1964 年支边的上海青年。他的工作是拦河大坝的测水员，很辛苦的。每年洪峰到来之时，他要一天三次到激

流中去测流量、水速，任滔滔的洪水把小船甩上波峰，又摔进浪谷。1974年夏天，出现了一次特大洪峰，据说是百年不遇，如果测不到这个数据，就会对历史欠下一笔债。水文资料似乎比人的存在更宝贵。他决定了，要动点真格的，要到大河河心去。危险吗？干这个工作哪能一点不担风险？他乘着小船去了，每秒1900立方的大洪峰，一个大浪把他的小船打翻了，他被洪水冲出几公里远，最后在一个平静的河湾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逝去时，才26岁。

啊！26岁，正是青春的花苞盛开的年月。今天26岁的青年会成双结对地进入于咖啡厅和迪斯科舞厅，会派头十足地穿着体恤衫，开着摩托车，显示出青春的风韵。然而，他，戴根发，却没有这一切，他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缀有48个补丁的黄军装走的，他是喝着玉米糊糊匆匆忙忙走的，他甚至还来不及品尝爱情的甘泉，还没来得及体味出生活的甜美……

十几年后的一天，笔者曾有幸再次来到这位被追记了一等功的青年英雄的墓地，看到的却是一片枯草衰败的荒凉景象。这里好像许久没有清扫了，壮大的一切似乎已经被人们所遗忘。对于英雄来说，他们似乎用自己的言行领悟到了人生的意义；然而，对于后人来说，是否能理解英雄玉洁冰清的情怀呢？当然，这毕竟是人们引以为自豪的。

然而，在人们的记忆中，更有许多平平凡凡的死者，他们正值青春年少，生命之火却在漠劲风中过早地熄灭了。像下面所列举的，恐怕不是个别的。

他是高中毕业后来到新疆的，文静，腼腆，以致于姑娘们叫他一声“秀才”，他都会红了脸。像这样一个青年，本来似乎应该在校园，在文化单位施展他的才能的。然而，命运之神鬼使神差地让他到大戈壁去放羊。孤身一人，没有歌声，没有鲜花，没有温情，只有羊群与他作伴。他留着长长的头发，穿着脏脏的衣服，拖着大大的皮鞋，却戴着一副秀郎架的眼镜。就这样，他度过了

青春中富于诗意和幻想的四年。

第五年，他患了一种奇特的难以治愈的病，学名叫“新疆出血热”，皮肤下渗出一块块血斑，发着高烧。这种病，国内的大医院尚无能为力，边疆农场的小小卫生队就只能望病兴叹了。他终于死了。在人们清理他的遗物时，一只小小的旅行箱，竟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唯独有几套书，却珍藏得像新的一样：《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泰戈尔的《飞鸟集》……

他们是如此钟爱生活，即使命运把他们抛到了荒凉的边地，他们仍憧憬着美好的世界！如果说，这位秀才多少有点迂的话，那么，彭玲娣的死却向世界剖示了她忠贞的心迹。

彭玲娣是阿克苏大光棉毛纺织厂的工人。对于农场的上海青年来说，她是幸运儿。她在城市里有一套水暖卫生设备齐全的楼房，她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是车间主任，一双儿女初中即将毕业。

她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她得了恶性肿瘤，一种罕见的癌。在回上海治疗以后，用了当代最先进的治疗方法，亦未能使她幸免于死神的追杀。

人之将死，其言必真。在弥留之际，她提出要回到阿克苏，要埋骨天山下。她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它，她想，她应该在那里得到一个安息之所。

飞机载着一个微弱的生命回来了。

仅仅六天之后，她含笑逝去了。

彭玲娣，这位普普通通的上海支边青年为这个60年代的社会群体竖起了一块碑。

他们是开拓者。

他们不仅把鲜血、热汗、青春、爱情献给开发西部边疆的事业；他们还把生命和灵魂化为一种理想之光，在昭示着一代代的后来者。

他们的姓名也许会被人遗忘。

然而，他们的精神是不灭的！

## 痛苦的反思

历史总是曲折地前进的。

作为中国知识青年的前驱，上海支边青年有着全国知识青年相类似的经历。在1980年前后，当一场回城风席卷中国大地时，在新疆，在塔里木，曾经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今夜有暴风雨》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然而，人们却没有抹煞黑龙江的知青们的历史功绩。历史造就了整整一代人，这代人中的精英至今还活跃在中国的广阔舞台上，为世人所瞩目——聂卫平、蒋大为、姜昆、梁晓声、肖复兴、陈可雄、陆星儿……可谓是星光灿烂。

同样，在这里笔者要披露一个同样震撼人心的故事——在25年的坎坷经历中，上海青年最不堪回忆的一页；人们也不致于因为这而抹煞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的历史功绩。

1980年11月，在新疆南部重镇阿克苏，发生了一场万人请愿回上海的知青运动。一万多名上海支边青年成立了“上海支青联合委员会”，选出了总代表，组成了“特别纠察队”，打出了“青春献给塔里木，壮年回到大上海”的旗帜。他们游行示威，绝食静坐，冲击机关，一度打乱了安定的局面和正常的生活……

历史在流泪。历史在促人反思——为什么当年高歌进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如今却采取如此激烈的对抗行动？他们为什么要自己否定自己当年选择的开发建设边疆的道路呢？

新华社派出的记者顾月忠，曾在塔里木河两岸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塔里木为什么留不住他们？》。文章是客观的，冷峻的，列举了六个方面的因素，回答了

人们的疑虑。在这里似乎没有细叙这篇文章的必要了，综合起来，有一个意思是明确的：一个落后的僵化的贫困的生产兵团对上海支边青年是没有任何凝聚力的！

边城失控了，机关停止办公了，例行公事只有转入地下。在80年代竟出现如此荒唐的局面，至今想起来还令人不解——这到底是谁的过错？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官僚主义？

1980年11月20日，在阿克苏街头出现了1200余人的绝食队伍。“上青联”宣布要绝食100小时，要逼上级表态。高音喇叭上，宣传队员们在高唱《思乡曲》。市中心的绝食点上，三口白皮棺材并排而卧，白生生的棺木在初冬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不知这是故作姿态吓唬人，还是抱定决心以死相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这场知青运动的领导者原是上海青年中默默的一员，然而，顷刻之间，却成了名扬遐迩的新闻人物。欧阳连，这个其貌不扬的支边青年被一股狂热、偏执的浪头推上了“上青联”第一把交椅的位置。

欧阳连，长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嘴巴微微有点瘪，算不得英武，却也显出几分强悍和精明。进疆前，他当过学校中的团支部委员，进疆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片原始胡杨林边的14团一个连队当过排长。他中年丧妻，膝下有一幼女，在戈壁深处父女厮守着过寂寞的日子。当知青运动的大潮涌起时，他一下子被推到了浪峰波巅，成了“上青联”的一号头头——总代表。他的手下一度有过八个保镖，号称“特别纠察队”，保护着他的安全。他住在阿克苏地委机关的一间套房里，和他的八人谋士团一起，策划着两万多名上海支边青年最终的“命运”。

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两万多名上海支边青年，其中有一万余人聚集在阿克苏，既不为什么政治目的，也不图什么经济利益，联络他们的竟是一个固执朴素的念头——“回上海”。为了这，他们竟铤而走险，把一群父母官们搞得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他们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1980年12月13日，阿克苏上空阴云密布，“上青联”的旗帜在初冬的寒风中颤抖。为了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由欧阳连的副手王良德——一个彪悍汉子——率领的远征乌鲁木齐的大蓬车队出发了。那年初冬，正是电影《大蓬车》风靡中国大地的时候，上海支青们看了电影，竟萌发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要组织大蓬车队远征乌鲁木齐。他们组织了八辆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送给各农场的交通牌大卡车，挂上帐篷，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边城阿克苏的十字街头举行了悲壮的告别仪式。人们唱着《思乡曲》，燃起浏阳炮，敲起了羊皮鼓，送别这远行的使者。深有趣味的是，车队还没有开出东城的牌楼，第二辆汽车上竖起的大旗竟杆折戟断——这是不幸的预兆吗？果然，车队在距阿克苏100多公里外的拜城县境内，在察尔其农场附近的山路上，就是这第二辆车，连续打了两个滚，终于倾覆了。三位上海支青死于非命，15个上海支青遭受重伤——酿成了这场回城运动中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惨祸。

当时的农垦局领导再也藏不住了。他们火速飞驰到翻车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本来不应该发生的惨剧。在灯光如豆的察尔其公社的卫生院中，两男一女的尸体静静地躺着，毁坏的面部几乎难以辨认。青年们欲哭无声，山区卫生院笼罩着一种难言的悲凉气氛。商店里的黑布全搬来了，出发时的红旗换成了白幛、白幡。八辆汽车，不，应该是七辆在第二天下午缓缓地驶回了阿克苏。两天前的大蓬车出发欢送大会会场，成了追荐亡魂的追悼会场。一幅大字挽联痛切地道出了这些青年们苦楚而混乱的内心：

活着回上海，拼将余生献四化

死在阿克苏，誓洒热血换户口

啊，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3日，这个阴霾的不吉利的

日子！

农垦局领导和地委领导终于与知青代表们见面了。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来了。农垦部的一位副部长也来了。“上青联”甚至打出了古训：“言必信，行必果”要求谈判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在阿克苏这座小城中发生的一切已经引起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一位领导在这个会上说：“个别地方在坏人煽动下少数支边青年的闹事……对这一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于是，25日深夜，阿克苏出动了200多名军警，对闹事的头头采取了收容行动。“上青联”头头几乎全部落网。

于是，28日，新疆军区宣布采取平息措施。一大批解放军开进了最不太平的闹事地区——14团。

于是，经过半年多的审讯、开庭，“上青联”的主要头头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欧阳连被判四年监禁，王良德被判三年监禁。他们不仅没有拯救两万多上海支边青年，他们也拯救不了自己。

然而，这个震撼了新疆的上海支青回城运动并非一点结果也没有。

结果是——13000多名上海支边青年终于按政策回到了上海。

结果是——国家承认了上海支边青年作为知识青年的地位，这是中国第一代老知识青年，是“接受再教育”这个历史运动的先驱。

结果是——60年代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成果正在被吞食。历史既没有完全否定它，当然也没有机械肯定它，历史留下了一个令人长久反思的难题。

顺便提一句，那些曾身陷囹圄的“上青联”头头已经从恶梦中醒来了。欧阳连，现在浙江某地搞供销，据说收入可观。王良德，蒙上海市劳动局的资助，开办了一个豆制品工厂。他贷款30



万，生产出了7种产品，产品一直打入乌鲁木齐。王良德成了一名小老板，然而，举步维艰，经营前途未卜。

历史该怎样评价他们呢？

## 冲浪，在改革的大潮中

80年代，阿克苏上海支边青年的队伍出现了一个分化、动荡、改组的裂变。回上海的，似乎步入了天堂，可是，留下的还有13000余人，他们仍在塔里木奋斗。

他们要从地窝子里爬出来，

他们要与传统的劳动方式告别，

他们要摒弃那种清苦贫寒的支青生活，

他们要让塔里木跟上时代，与祖国同步前进！

于是，他们用上海人的机敏、睿智与勤奋，在改革的大潮中搏击风浪。

于是，在塔里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走来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弄潮儿。

在塔里木腹地的阿拉尔，有一片废弃了的厂房，一堆闲置了十几年的机器。在“史无前例”时，这里曾经是武斗的战场，在高达30米的大烟囱旁还留着屈死的冤魂的悲鸣。打这以后，这个曾耗资好几百万元的火电厂遗址，便成了一堆荒丘。

1984年，从塔里木河南岸来了一个“阿拉”，他要在这里办食品厂。他叫范跃彬，是拖拉机手出身的土技术员。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是一无所有的阿拉尔食品厂的新任厂长。

进疆前，范跃彬只是一个顽皮的学生。他好动，聪慧，什么都想摸一摸，动一动，这种天生的性格，使他终于在机耕队中大显身手。他可以闭着眼睛拆卸进口康拜因，他会钳工、电工，会